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8期（民國104年6月），205-2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中國發現近現代史：李懷印教授近著相關問題商榷*

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vii + 338 pp.

葉毅均**

李懷印目前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歷史系，先前的兩部英文專著皆以近代中國農村史爲研究範圍，《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眞實》一書則轉向同時代之中國史學史，作者自認有其個人學思歷程轉變的內在因素。[1]（pp. vii-xii）然而，從書名之擬定、分析的語彙到寫作的手法，卻頗能反映今日英語學界中國研究的時勢流風。正如一位評者所稱道，本書乃是研治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所必讀。[2]同時，對於本書內容不及含括的部份，乃至於未曾言明之處，或許也同樣值得吾人予以指出並加以深思。[3]

* 本文承蒙學友溫楨文博士惠賜相關書籍與寶貴意見，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員
1 更清楚的表白可參考作者之〈重新認識鄉村中國——兼談我的治學經歷〉一文最後的「後記」部份，收入王希、姚平主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479-485。
2 Paul G. Pickowicz’s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4:1 (June 2014), p. 169.
3 目前在中國史學界裡，針對本書最具份量與價值的評論，可見：趙慶雲，〈近代中國主敘事的源起、流變與重構——評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頁 115-129。

一、立場、方法與理論

本書關注的是從二十世紀開始直至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透過歷史書寫，建構出各種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master narrative），而這些不同的主敘事又各自折射出哪些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變革。作者採取「挑戰與回應」的觀點，開宗明義地宣稱：「有關『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之歷史寫作的演變，主要是出於個人所面臨的現存挑戰和關懷的一種回應；他們書寫近（現）代中國，主要是爲了追尋此一國家當前問題的歷史根源，以求正當化其解決辦法（solutions），而非一種追求眞理的過程，或是爲了重建眞正發生的過去」。（p. 1）由於十九世紀以降的中國近代史與二十世紀史家生活的年代相距不遠，史家撰述誠然不能免除個人動機（其實向來如此），但這是否即代表他們不認爲自己同時也是在「追求眞相」、「如實重現過去」？或者史家的主觀意願並不重要，由於他們言行不一，因此不値得加以重視？作者稍嫌武斷之聲言，似乎過於簡化了史學史的問題與深度。

對於史家與時代複雜的辯證關係，余英時早在四十餘年前即已提出精闢的觀察。[4]近年王汎森又續有所論，以實例說明「時代與史家的經歷提供了一雙獨特的眼睛，幫助人們看到過去視而不見的現象，或是開顯了過去不識其曲折意義的歷史面相」。在某些情況下，「史家主觀的思想與意志，與客觀的歷史建構趨於一致，不必爲了傳達自己想對時代發出的訊息而扭曲手中的歷史」。譬如陳垣的《通鑑胡注表微》，「既表達時代的處境、史家的關懷，同時也發掘了歷史的事象，三者『套疊』在一起」。[5]王氏的說法，不啻爲深受後現代史學影響下的某些極端說法，施諸強而有力的針砭。反過來說，若史家意欲針

4 余英時在 1973 年的演講以〈史學、史家與時代〉爲題，刊於其《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頁 247-270。

5 王汎森，〈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期 23（2011 年 12 月），頁 3-18；另收入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頁 187-206。

對當時國家、社會所帶來的「挑戰」做出某種「回應」，也不必然歸趨於撰寫近現代史，借古諷今或甚至古爲今用的例子所在多有，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之作，乃至於其古史研究皆然。[6]由於中國本身的歷史與史學傳統源遠流長，可供挖掘和採擷之處甚多，不僅僅在 1949 年以前，新興的「中國近現代史」相對於古代史研究而言不是主流，即使到了中共建國之後、文革以前依然如此。[7]那麼所謂「古事今情」的史家心曲，恐怕也是以古代史領域爲其表現之大宗，近現代史難以望其項背。這是筆者在推崇本書之餘，不得不提醒讀者的一點。

作者繼而又言，本書主要關注的是「檢視史家致力於忠實地重建中國過去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與他們自身所服膺、服務於某一政治議程之想像的歷史軌跡相妥協」。（p. 2）不過，既然如作者所言，由於中國近代史仍在進行之中，尚未結束，充滿了不確定性，致使「中國史家」受限於特有的空間性（spatiality）與時間性（temporality）。前者意指史家與塑造這段歷史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之關係，後者則指史家本身所處的時間點，永遠是僅具有暫時的性質而非蓋棺論定。（p. 2）那麼不禁令人納悶的是，作者本人又是以何種身分自外於所謂的「中國史家」，得以成爲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an point），既可擺脫空間性所帶來的政治意識型態之干擾，又能無視於時間性的永恆束縛，執持非目的論的全景視點，對前行者加以評估？作者主張，由於全球化的

6 參見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0（1998 年 12 月），頁 285-334；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二十一世紀》，期 29（1995 年 6 月），頁 84-90。顧頡剛是另一個好例子。韓子奇就曾指出，顧氏的古史研究相當於他對現在的批評，及對未來的處方。Tze-ki Hon, “Ethnic and Cultural Pluralism: Gu Jiegang’s Vision of a New China in His Studies of Ancient History,” *Modern China*, 22:3 (July 1996), pp. 315-339。

7 許倬雲指出，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在大陸時代尚未發展爲獨立專業」。許倬雲，〈百年歷史學發展〉，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主編，《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上冊，頁 98。羅志田則說明文革「『十七年』對 1949 年以前史學的最顯著的延續，就是古代史不論從研究者的數量、論著數量和引起關注的問題看，都遠遠超過中國近現代史」。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年」裡才開始改觀。羅志田，〈轉變與延續：六十年來的中國史學——偏重中國近代史研究〉，《經典淡出之後：20 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 85。

時代帶來了嶄新的歷史條件，「西方」的霸權不再，透過重新界定並擴展延伸這段歷史的空間性與時間性，便可重寫「中國近現代史」。姑且不論類似的論題早已有人提出，[8]若謂遠離故土、但心繫祖國的離散華裔（Chinese Diaspora）學者之時空性便足以帶來上述保證，則未免既小覷了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所論之清末以降近代中國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現象（亦即中外關係無可逃脫），又重蹈了黃仁宇自命「站在『歷史後端』，『綜覽』了『全部經過』」的史學觀點。[9]

全書最精彩之處，乃是應用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提出的「情節編織」（emplotment）概念，具體梳理（或如作者所謂之「解構」）各自偏向不同政治勢力之闡釋「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由於懷特認爲，「每一種歷史，即使是最具『共時性』（synchronic）或『結構』（structural）的歷史，都是以某種方式加以情節化了的」。[10]汲取自弗萊（Northrop Frye）的文學批評理論，懷特區分出四種不同的原型情節結構：傳奇（romance）、喜劇（comedy）、悲劇（tragedy）、諷刺（satire）。當史家試圖「解釋」什麼「眞正發生」時，這些原型情節結構所提供的認知作用，正在於提出一個關於歷史

8 如錢新祖之〈近代人談近代化的時空性〉，《思與言》，卷 21 期 1（1983 年 5 月），頁 13-20；另收入鐘月岑等合編，《錢新祖集第二卷：思想與文化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3-15。

9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9-204；William C.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pp. 870-890；劉季倫，〈歷史與自由——評黃仁宇的歷史理念〉，《新史學》，卷 13 期 3（2002 年 9 月），頁 196。劉文另收入氏著，《現代中國的思想與人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311-361。値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書將眼光侷限於中國大陸的史學發展，因此不及於討論黃仁宇所提出之「中國的長期革命」，亦即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化爲現代社會的必要過渡此一觀點。正如陳正國所言，現代化概念是黃氏「思考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主軸與指導原則」。陳正國，〈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卷 12 期 4（2001 年 12 月），頁 157。以黃仁宇諸多論著在海外的廣大影響，不談此一「主敘事」當然難免有所缺憾。

1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7-11, esp. p. 8.

之眞實型態的意象（image），以獲取其「解釋效果」（explanatory affect）。然而，不同於懷特將此一理論用於定位十九世紀、而且是個別的史家，本書作者則將之擴大爲描述特定時代的集體敘事模式。

作者認爲，二十世紀出現的「中國近現代史」形成了兩大典範，一爲現代化敘事，一爲革命敘事。前者以蔣廷黻和陳恭祿爲代表，後者則以范文瀾爲首要。雙方對近代中國的史事鋪陳重點不同，由此反映出來的意識型態取向也有重大差異，但同樣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史學，同樣是爲了處理當下、應對未來而生。作者將 1949 年以前、非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敘事稱爲「悲觀主義」（pessimism）式的敘述或再現模式，以其歷史敘事充滿了挫折感故也；以「浪漫主義」（romanticism）命名同時代之中國共產黨人針鋒相對的革命敘事，其激進化的傾向直至文革時達到高峰。相反地，在後毛澤東時代，當改革開放的年代來臨，歷史解釋中的現代化敘事再次興起，但基調不再悲觀，反而變成「樂觀主義」（optimism）的模式。最後，進入二十一世紀，受到後現代主義拒斥宏大敘事的影響，「懷疑主義」（skepticism）便成爲中國近現代史寫作的新趨勢。有了以上架構，除了兩兩相互比較之外，作者更能將此一四部曲譜出大氣磅礴的樂章，構成一部首尾連貫之「中國近現代史」的史學史。同時在參差互校、凸顯異同之餘，避免重現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批評之「線性歷史」（linear history），蓋此四種模式之間並非進化式（evolutionary）的關係。在欣賞作者持論的巧思之餘，筆者不免有疑，懷特運用的四種原型情節結構其來有自，並未脫離其研究對象的時代脈絡：由於他筆下所論之十九世紀史家，深受其時之古典與基督教文學薰陶，提煉自文學作品的類型或主題自然而然可成爲他們信手拈來的思想資源，從而在無形中形塑其歷史書寫（說故事）。但本書作者對於此種敘事模式的擴大解釋，儘管言之鑿鑿，卻又是基於何種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基礎來立論？難道某種引導眾多史家的意識型態即內在蘊含了特定的敘事模式？（但懷特並不這麼認爲）這些根本的理論問題在本書中從

未獲得澄清。[11]

二、敘事缺漏

另一方面，本書雖然建構了前後延續、以中國大陸史學發展爲「中心」的敘事，代價卻是犧牲了可供絕佳對比的另一「邊陲」。在將 1949 年以前的現代化敘事定義爲一種民族主義史學之時，作者的追溯分析以蔣廷黻之著述爲主，輔以陳恭祿的專著，隨即戛然而止，不知所終。由蔣氏所開創的現代化敘事彷彿隨著 1949 年的政權轉移而中途腰斬，直到 1980 年代才獲得轉世重生，重霸史壇。然而，「學而優則仕」之蔣廷黻未竟的學術志業，實有郭廷以賡續爲之，至少在 1950 年仍高聲倡論「中國近代化的延誤」。[12]其後更在臺灣創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原有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外另立旗幟，發展專責「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術社群，而有「南港學派」之譽。[13]相較於范文

11 彼得・柏克（Peter Burke）曾經引用懷特之說以論證道，西方史學的文學形式與其內容一樣具有獨特性，尤其是懷特所謂情節編織的例證皆來自於傳統的西洋文類（literary genre）。柏克因而接著追問，對於非西方的史學傳統而言，「本土的文類是否在史家的工作中扮演著同樣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模型角色，如同懷特在蘭克（Ranke）、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托克維爾（Tocqueville）等人的案例中所見呢？」Peter Burke,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 Theses,” in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2), pp. 26-27。因此，本書不加辨別地應用懷特的分類，恐怕會令人陷入更深的困惑。至少如沙培德（Peter Zarrow）針對本書的書評即認爲，現代化敘事和革命敘事有許多共通點，似乎皆可納入懷特分類下的浪漫式情節編織。Peter Zarrow’s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2:4 (November 2013), p. 979。

12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悞——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大陸雜誌》，卷 1 期 2、3（1950 年 7 月、8 月），頁 7-10、16-20；另收入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 3-25。郭氏門人呂實強指出，此文「當爲在我國以近代化爲主題作學術討論最早的一篇文章」。呂實強，〈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8 期 4（1975 年 4 月），頁 12；此文另收入氏著，《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 326。高明士則指出，在 1960-1970 年代的臺灣史學界，「近代化」問題已成爲熱門話題。高明士，〈戰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收入林建甫編，《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49-200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上冊，頁 27。

13 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收入李金強主編，《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72-194。亦可參考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郭廷以先生與近代史學風〉，兩文皆收入其《20 世紀非主流史

瀾在 1950 年的中國科學院轄下率先創設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近史所籌備處的成立醞釀多時，但也僅僅晚了五年，也同樣受到當時專治古代史的史家多所批評。兩者的處境雖殊途而同歸，在史學史的發展上極富象徵意義。[14]更有甚者，中研院近史所在 1970-1980 年代成爲中國現代化研究的大本營，以集體的區域研究計畫，倡言「中國的近代史便是現代化之史」。[15]日後部份相關成果在兩岸頻繁的學術交流之下，還以簡體字在中國大陸重新出版。現代化敘事在中國大陸史學界捲土重來，除了如本書所述，直接引進美國社會科學界的理論成果之外，此一「現代化理論的『臺灣經驗』」對此是否有所影響，或者是最起碼的推波助瀾，也早已爲學者所好奇。[16]作者忽視這段史實，更不深入追究在冷戰年代裡，兩岸學術建制複雜的交互作用與競爭關係，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皆難以令人完全信服。何況這也與作者拓寬空間（widen space）的訴求相違背。

學與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2-34。

14 關於中科院近史所的成立，詳見趙慶雲，〈論一九五〇年代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思與言》，卷 48 期 2（2010 年 6 月），頁 1-48。至於中研院近史所的設立過程，則可參考由陳永發執筆的記述：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卷一：任重道遠（全院篇）》，頁 70-73；以及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臺北：國史館，2010），頁 307-312。根據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李恩涵所言，該所之設立，正是由於對岸的中科院近史所開始出版史料，因此「爲了與中共全面對抗並搶奪下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實鑑定權與史實解釋權」，當時的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才決定聘請郭廷以籌備設所。李氏同時亦認爲，郭廷以當時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術著作，在分量上「遠遠超過了」其對手。李恩涵，《八十憶往：家國與近代外交史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1），頁 80-82。

15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下冊，頁 851。同屬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的王爾敏則回顧道，早自創所之時，「我們一開始的研治方向，因郭廷以先生教導啓示，實一致用心於中國近代化史實之發掘探究」，早於美國學界流行之現代化理論。王爾敏，〈當代學者追求史學理論之蕪濫〉，《新史學圈外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93。

16 以筆者有限的聞見，此一提問最早見於呂芳上的評論意見。陳惠芬，〈範式之轉換：現代化理論與大陸史家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冊 2，頁 1598。

細究其實，郭廷以治近現代史的學術淵源，直接來自柳詒徵與羅家倫的教學啓迪，其中又以後者的影響最大。[17]而羅家倫和蔣廷黻的學術交往，更肇始於兩人早歲留學美國之時。[18]日後歸國，蔣氏從天津南開大學轉任北平清華大學兼歷史系系主任，亦是出於時任清華校長的羅氏之請，從而因個人志趣與地利之便相結合（在北平較易蒐購舊籍），使蔣氏自謂其清華五年有如「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19]研治「中國近現代史」的臺灣學者對自身學術系譜了然於胸，對這段歷史早已有所考察，並評判蔣、羅兩人的主要貢獻，是「爲近代中國史尋繹一條適切的研究途徑，並從中提出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看法」。而他們兩位學術的繼承者郭廷以，則「將這個理念加以落實，開創中國近代史一處全新的研究領域」。[20]但本書只見蔣廷黻唱獨角戲，全然沒有羅、郭等人的蹤影，實在有欠全面。事實上，早在 1947 年，顧頡剛在其名著《當代中國史學》中就已將蔣廷黻之《中國近代史》（1938，其後在臺重版易名爲《中國近代史大綱》）與郭廷以之兩冊《中國近世史》（應爲《近代中國史》，1940-1941）比論，認爲兩者看法相同，前者「言簡事賅」，後者則「搜輯完備，考證精詳」。[21]顯示蔣、郭兩人之著作並列，已是一部份時人的認知。[22]

---

17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記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 129、149。

18 劉維開編，《羅家倫先生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6），頁 40。亦見王聿均，〈蔣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1986 年 3 月），頁 17。

19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29。蔣廷黻在 1932 年致羅家倫的一封信函中，亦曾提及：「前年來清華時，純因兄適主校政，弟思在兄熱心指導及合作之下，或能有所見〔建〕樹。蓋一般人視史學爲學界之奢侈品，不願多費，而史學非經費充足不可。主校政而深明史學之重要如兄者，實未見也」。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409。由此可見羅氏大力支持蔣廷黻蒐集近代史料一事，對後者開展其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20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卷 42 期 4（2004 年 12 月），頁 60。

21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收入《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12，頁 393。

22 王爾敏先已引證顧氏此書指出這一點。王爾敏，〈郭廷以之史學〉，《國史研究通訊》，期 1（2011 年 12 月），頁 132。然而，必須納入考慮的是，正如王學典注意到的，顧氏這部屬於「史料考訂派」的經典學術史著作有其偏頗之處。因爲其中「唯物史觀派」的史家除了郭沫若之外，基本上都受到忽略，就連范文瀾也不例外。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作者稱道蔣廷黻在其書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解釋，「塑造了往後數十年主流的中國近（現）代史寫作」（p. 45），並引用劉鳳翰之〈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一文，說明蔣氏被譽爲是近代中國研究上「一個開山的人」，其新方法與新觀念開創了新風氣，將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23]但實際覆按劉氏原文，此語全出自郭廷以爲蔣廷黻在 1964 年 4 月 18 日蒞臨中研院近史所所舉辦之談話會上所做的開場白，劉文即爲此一談話會之紀錄。換句話說，本書對於蔣氏塑造「主流」歷史寫作的定評，實源於郭廷以本人的判斷與追認，卻不知何故隱去郭氏其名，致使出處不明。[24]而本書既排除了對於戰後臺灣史學發展的討論，則所謂「主流」云云，又無從索解。至少在 1950 年代以後、1980 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史學界，蔣廷黻之史學又何曾有過容身之地呢？[25]相反地，至少就正規的歷史教育而言，根據中研院近史所現任所長黃克武的回憶，他在 1970 年代後期的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就讀時，受業於郭廷以「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李國祁，課堂上所用的教材仍是前述之蔣氏《中國近代史大綱》與郭氏《近代中國史》，加上李劍農之《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942），基本上乃是一套「以李劍農、蔣廷黻與郭廷以著作爲中心的國族主義史觀」，以致成爲黃氏個人「接觸近代史的開端」，

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良史的命運》（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 154-155。事實上，鄧嗣禹在顧氏此書出版不久，便曾含蓄地指出其偏見。S. Y. Te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Far Eastern Quarterly*, 8:2 (February 1949), p. 144, n. 14。

23 劉鳳翰，〈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傳記文學》，卷 7 期 6（1965 年 12 月），頁 27。

24 反倒是今日有心的中國大陸史學史專家在編纂史學工具書時，於蔣廷黻之《中國近代史》一書出版年份的條目下，明白無誤地引用郭廷以上述評價。該著作雖因體例所限而未標註出處，至少引文出自何人所言，毫無模稜兩可的空間。王學典主編，陳峰、姜萌編撰，《20 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00-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下冊，頁 767。

25 此中正如張海鵬所說，「蔣廷黻在 1938 年提出現代化範式以來，經過了半個世紀，並無應者」。張海鵬，〈20 世紀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的探索〉，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編選，《張海鵬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80。若不包括臺灣在內的海外中國史研究學界，其說自可成立。相反地，蔣廷黻的史學透過郭廷以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兩人的繼承，分別在臺灣與美國有重大影響。尤其是透過《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整理工作，即可見一斑。詳見張志雲、侯彥伯、范毅軍，〈瞭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佈〉，《古今論衡》，期 24（2013 年 6 月），頁 83-114。

甚而奠定其研究基礎。[26]兩岸分流的學術傳承在此對比明顯。

除了上述因遺漏而導致的自相矛盾之外，關於羅、郭兩人的師承關係，同樣旅美的華裔學者王晴佳更早便注意及此，並在其英文專著中特闢一節，探討五四青年羅家倫對於近現代史的求索及其先驅地位，以之與傅斯年在古代史研究上的創發相提並論。猶有甚者，王氏認為羅家倫在 1929 年所提出的歷史分期，如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等分界點對後世影響深遠，不但廣為臺海兩岸學界所接受，也在諸如范文瀾之《中國近代史》（1947）中得到迴響，成為中國大陸史學界對於「近代史」（1840-1919）和「現代史」（1919-1949）分期的基準。[27]若謂羅氏並未提出足以媲美蔣廷黻的主敘事，因而略過不談，那麼郭廷以備受稱譽之兩冊《近代中國史綱》又何以閉而不納？[28]況且此書根據郭氏自述，原預定 1929、1930 年間在清華大學由蔣、羅合撰（郭任助手），後因兩人「任重公忙，無暇及此」，數十年後才在蔣廷黻本人的殷殷勗勉之下由郭氏完成，其中學術傳承的意味不言可喻。[29]現代化敘事在此結穴，但本書完全不曾給予應有的重視，不得不謂一大敗筆，也錯失了複雜化其敘事的機會。[30]

---

26 林志宏訪問，周維朋記錄，〈黃克武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上冊，頁 75-76。

27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130-148, esp. pp. 132, 141.

28 郭氏及門弟子陸寶千認為，《近代中國史綱》一書是「相對於中共解釋中國近代史而產生的唯一高水準的學術著作」。陸寶千，〈我和郭師量宇的鐸瑟因緣——前緣後分皆如水〉，收入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556。此外，李弘祺則指出，此書「最能全面處理中國近代史」，為「近數十年以來，用中文著述有關近代通史的上乘作品」。李弘祺，〈近、現代史（二）〉，收入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冊 5，頁 109-110。林正珍亦在眾多類似通論之中獨獨挑出此書，稱其「至今仍倡〔暢〕行台港」，「為大學院校重要參考著作」。林正珍、劉瑞寬編著，《中國近現代史》，收入高明士主編，《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冊 6，頁 12。

29 郭廷以，〈小記〉，《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上冊，無頁碼。

30 汪榮祖的書評已提出此點，見《漢學研究》，卷 31 期 3（2013 年 9 月），頁 371。本書作者對此也有所回應：「這本書沒有顧及臺灣地區學者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尤其是他們的中國現代化史研究。不過這本書的寫作重點，是放在大陸境內的近代史研究，尤其是歷史敘事的建構，無意做到面面俱到」。李懷印，〈近代中國無須「重新發明」——答汪榮祖先生〉，《中國圖書評論》，2014 年第 5 期，頁 55。其後汪、李兩人仍續有辯難，茲不贅引。

三、港臺攻玉

其他美中不足的是，儘管作者極力蒐羅中國大陸學界的二手研究，但臺港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本書中竟大多不見提及。筆者僅見作者引用劉鳳翰前述一文而不及其餘〔但又不肯放過中國大陸學者楊奎松最初在臺出版之《西安事變新探》一書（pp. 256-257）〕，多少有些匪夷所思。[31]其實港、臺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社群雖然不如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學術隊伍來得龐大，但多年來也累積了不少深入的研究成果，可供本書作者參考。譬如，本書論及 1930 年代的現代化論述（modernization discourse）時，傾向於歸納出其一致性，但若能參考潘光哲對於「現代化」一詞的概念史分析，便可知曉時人對於「現代化」的認知，實包含了四種不同的語用意義，從而「形構爲指導他們理解世界的『後設語言』之一」。[32]潘文更點出蔣廷黻籲求中國「及早現代化」的基本論旨，往後也在殷海光與金耀基等港、臺知識分子的論著中不斷重現。不過，這當然也不在本書作者的視野之內。

又如，本書討論范文瀾史學的部份已相當細緻，尤其是著墨於其革命敘事的歷史分期，率先採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說，與毛氏和張聞天在共

---

31 順帶一提，劉鳳翰在本書中被誤植爲“Liu Fengxiang”（pp. 45, 315），應爲“Liu Fenghan”。其他手民之誤尚有：范文瀾之生卒年應爲 1893-1969 年，而非 1891-1969 年（p. 74）；第一章註 2 提及之張海鵬被誤植爲“Zhang Haiping”（p. 279），應爲“Zhang Haipeng”；第三章註 17 引用陳其泰之《范文瀾學術思想評傳》的一段記述，以說明毛澤東如何公開表示對范文瀾的支持，但誤引爲程中原之《張聞天傳》（p. 285）；第五章註 6 將翦伯贊夫婦自殺的年份誤爲 1966 年（p. 286），應爲 1968 年；參考書目中之“Luo Shuwei”中文誤植爲「羅澎偉」（p. 317），應爲「羅澍偉」；沈志華和沈登苗皆誤「沈」爲「瀋」（p. 320）；王學典之名文〈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時期黎澍側記〉，則誤「黎澍」爲「李澍」。（p. 323）其他更加明顯的排版錯誤，則不予贅述。

32 根據潘文的分梳：「一、『現代化』可以被理解爲蘊涵著『進步』的普遍意義；二、『現代化』可以是對於某種現實狀態的評估標準；三、『現代化』可以是一種目標的期待；四、『現代化』可以是開啓知識份子對中國國族（各個領域）的前景想像空間的無限大範疇」。潘光哲，〈想像「現代化」——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新史學》，卷 16 期 1（2005 年 3 月），頁 100-106。另外，亦有運用電子資料庫以查考「現代」一詞的語義演變者。參見陳碩文，〈「現代」：翻譯與想像〉，《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2（2012 年 6 月），頁 339-352。

產黨內從事意識型態鬥爭的關係密切，乃至於范氏在 1950 年代中期的中國近代史分期討論裡，獨排眾議，基於毛澤東的〈矛盾論〉而推演成己說等等。但就范、毛關係而言，仍不如香港之許冠三直言范氏「其職責有類封建朝廷之史官」，其史學思想乃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唯物論，它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關係，亦如毛澤東思想之於馬克思主義」等語來得籠罩全局，令人警醒。[33]而范氏以箋注「毛澤東思想」而摶成的中國近代史主敘事，至少從 1940 年代初期開始，對毛澤東本人的切身利害而言，更遠遠比不上他念茲在茲清算王明、建構以毛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來得重要。[34]這也是本書未嘗措意，因而論述多少有失平衡之處。

同樣地，本書論及以翦伯贊為首的資深史家，在大躍進結束之後，以「歷史主義」為名反擊史學革命中的「以論帶史」作風，作者對翦氏言論的剪裁極為精當。但若能參考許冠三之考證，便能知曉「歷史主義」一詞原出自毛澤東，以及此詞在翦伯贊的思想脈絡中如何開展，何時開始成熟發揮，而不會令人有倏然出現、不知所以之感。況且，這不僅僅是翦氏批駁一時之學術風氣的興到之見而已，因其提出於 1952 年，尚遠早於「史學革命」（亦即史學領域的大躍進）起始的 1958 年，在學術史上自有其地位。[35]本書對此則在引證之餘，缺乏相應的評價。

再如，本書所重現之「中國近現代史」主敘事有個「遺失的環節」（missing link），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歷史敘事。逯耀東曾論及由四人幫所提出的「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由上古一直貫穿到近現代，至少在 1974 年北京「梁效」

33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下冊，頁 145-146。

34 亦即 1945 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的〈歷史決議〉，毛澤東利用此次黨史修纂進行政治鬥爭。中國大陸史家高華認為，此一文件的作用在於為毛澤東在 1949 年後的每一場權力鬥爭服務，直到 1966 年劉少奇垮台。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626-636。關於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與延安整風運動，乃至於重寫中共黨史的關係，亦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二版），上冊，頁 377-400。

35 許冠三認為，翦伯贊以歷史主義為主的史學綱領，「確是馬列史學五十年來罕見的『創造性發展之一』」。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下冊，頁 115-144，所引在頁 134-139、143。

的輿論陣地《北京大學學報》上曾連載〈儒法鬥爭史概況〉一文，具體將中國史上的儒法鬥爭劃分爲三個時期，最後一個時期便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儒法鬥爭」，其中又細分爲四個階段。[36]此一敘事在當時的言說中地位如何？與此前此後的主敘事又有何差異或繼承關係？套用逯氏對文革「批孔」之「影射史學」的反省：「不論今日中國大陸對這種解釋如何批判與清除，都無法否認這是他們史學發展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同時也實踐了毛澤東思想的『更進一步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結合的認眞研究中，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造』的指示」。[37]因此，在回顧歷史時，對於這個極端年代裡的主敘事似不宜一概無視，置於不聞不問之列。[38]

最後，本書討論 1980 年代的「新啓蒙」史學，以當時的《歷史研究》主編黎澍爲主角，確然十分切題而得當，但對於同樣在這場「新啓蒙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的李澤厚和金觀濤、劉青峰等人卻一字不提，似乎有欠公允，儘管他們當時並非專業史家。特別是李澤厚與本書論旨相關的兩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在中國大陸風行一時，在臺灣亦長銷不斷。[39]李氏「救亡壓倒啓蒙」的觀點，乃至於爾後倡言的「告別革

36 逯耀東，〈「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的形成與批判〉，《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 25-68，所引在頁 32-36。

37 逯耀東，〈批孔，革命史學的樣版戲〉，《史學危機的呼聲》，頁 23。毛澤東之語出自其〈整頓黨的作風〉（1942 年演講），但文字與逯文所引稍有出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二版），卷 3，頁 820。

38 相較之下，儘管張海鵬、龔雲兩人認爲文革時期「沒有學術研究，只有政治鬥爭」，因此這一時期的學術史「是不必要詳加論述的」。但最終仍以一章的篇幅概述其時的中國近代史「論著」，兼及具代表性的個案分析，反而是較爲負責任的做法。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 335-354，所引在頁 338。此外，德里克（Arif Dirlik）也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區分爲三個時期，文革正是其中的第三個時期。如同第一個時期（1927-1937），此一時期再次將革命問題直接帶入歷史寫作之中，最後以將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主義」的化約論告終。翦伯贊之死便象徵性地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霸權地位宣告結束。Arif Dirlik, “Marxism and Social History,” in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75-401。

39 如汪暉所坦言，「思想史研究是八〇年代中國知識份子介入當代進程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李澤厚的三部《思想史論》（加上《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是影響最爲廣泛的著作。何吉賢訪問，〈闡釋「現代中國」：挑戰與難題——專訪汪暉教授〉，收入鄭文惠、顏建富主編，《革命・

命」之說，皆與黎澍反對暴力革命的主張近似，甚至也與後者同樣一字不差地提出「西體中用」，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難道不值得析論其異同？時序進入 1990 年代，金、劉兩人合著之《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93）處理 1840 年到 1956 年的中國歷史，可否稱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主敘事」之一？而黃克武則對兩者皆有頗具思想深度的評估。[40]就此而論，相對於注目社會史甚至是「新社會史」的興起，作者對於「思想史」的態度卻十分曖昧，因自李澤厚以下的思想史家在本書裡並未佔有一席之地，好似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建構」過程之中，沒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這回事，這與部份中國大陸史家的看法有相當的出入。[41]就臺灣史學界而言，這也與戰後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實況有所扞格。[42]恐怕更多反映的只能是美國之中國研究現況——對思想史興致索然。

啓蒙‧抒情——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1），頁 322。

40 黃克武，〈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5（1996 年 6 月），頁 425-460；黃克武，〈解除歷史魔咒的迷思：從《開放中的變遷》看金觀濤、劉青峰的中國近代史觀與政治思想〉，《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9（1995 年 3 月），頁 130-155。

41 至少在晚近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基本理論問題文獻匯編》中，也收入若干討論思想史（金冲及、程歗）、甚至哲學史（張琢、石峻等）的文章。梁景和主編，《中國近代史基本理論問題文獻匯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上冊，頁 154-168、291-299；下冊，頁 1624-1648。另如葛兆光則力主思想史研究對於今日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強調在 1990 年代中葉以後有所謂的「思想史熱」，持續至今，駸駸然有以「思想史」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態勢。葛兆光，〈思想史爲何在當代中國如此重要——葛兆光教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講演〉，《文匯報》，2010 年 5 月 22 日，6 版。旅澳華裔學者馮兆基亦曾專門討論民國時期如何奠定「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基礎」。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 學者經由量化統計八種學術期刊論文的結果顯示，在 1945 年到 2000 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史才是歷史學工作者的最愛」，在總數約略過千篇的論文中佔有三成比例，於各種專史之中排名第一。彭明輝、唐志宏，〈臺灣地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以學術期刊與博碩士論文爲分析對象（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0（2003 年 5 月），頁 397。潘光哲針對臺灣唯一不以特定學術機構爲依託、且出版至今已逾四分之一世紀的專業綜合性刊物《新史學》所建構之「近代中國」圖像的質性分析，亦頗聚焦於觀念詞彙與歷史人物的思想軌跡，明確顯示思想文化史在臺灣史學社群裡的影響力。潘光哲，〈「深描細寫」與關於近代中國的歷史知識的生產——以《新史學》爲中心的討論〉，收入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爲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 244-264。

四、結語：代評估

整體而言，作者對 1949 年以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之內部爭論，條分縷析，論述頗具見地。儘管本書在理論基礎上極度仰賴懷特所著之《後設史學》（*Metahistory*）的創發，但在實質架構上毋寧更接近作者早年所心儀的柯文（Paul A. Cohen）之《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對美國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批判。本書既權衡過往的研究理路之得失，又企圖提出未來可行方向的一己之見，實可謂《在中國發現歷史》之中國版。[43]然而，兩者有所不同的是，柯文所提出的「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乃是基於他對 1970 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之評估，進而以一整章的篇幅，加以有意識地詮解與提倡。而本書所強調的「在時而開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中國近現代史觀，除了以不足 3 頁的舉例說明之外（pp. 268-271），卻無更為具體的成果加以落實，終歸是破多於立。[44]即便是作者同樣欲超越的杜贊奇之「分岔歷史」（bifurcated history），其書第二部份也是以數件堅實的個案研究所組成。[45]因此，與其孤立地引用胡繩晚年反對歷史必然性的意見（亦即中國共產革命不必然成功），在尚未自出機杼之前，作者倒不如師法柯文之故智，擇要選取諸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之近著《安源》（*Anyuan: Mining China's*

---

43 此外，本書亦不時可見柯文另著《歷史三調》（*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的影子，如末章〈結論〉所提出的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與歷史實在（historical realities）相關聯之三種型態。（pp. 261-264）可直接參考柯文本人對其觀點的摘述：Paul A. Cohen, "Three Ways of Knowing the Past," i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200-220。

44 有評者對於本書所指鵠的逕以「新的全球化典範」稱之，但實不知所指為何。Ori Sela's review,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1 (March 2014), p. 156。倒是杜贊奇曾提出一個全球化典範的假說，注意到全球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體系與霸權式的現代性世界觀，以取代或涵括舊有的現代化典範。Prasenjit Duara, "Introduction,"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5-12。

45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chs. 3-6.

Revolutionary Tradition）等加以品評，以具體例示其心目中理想的研究取徑。[46]

除此之外，在從事研究的目標方面，本書作者呼籲「重建一個新的主敘事」，使之「不僅僅能更加貼近中國過去的客觀實際，同時也對理解今日中國及其未來的發展途徑具有意義」。（pp. 265-266）在此，作者似乎一方面訴諸敘事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又回到傳統史學「鑒往知來」的觀點。不過，柯文的書評對此則明確表示不予贊同。他認爲中國史學若能棄絕建構另一個主敘事之誘惑的話，將會發展得更好。[47]其實若考慮到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對於文革在中國大陸的論述現狀之探討，一個能使人們面對進而反省過往創傷的主敘事（如同戰後德國之於「第三帝國」所公認的主敘事），仍然是有必要的。[48]只是作者既然對於所謂「中國史學的『內捲化』（involution）」深有憾焉，不滿「中國史家」總是自囿於借用來自西方的概念從事經驗研究，而非自主性地建構理論創新。（pp. 259-260）那麼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本書最後引用德里克（Arif Dirlik）「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之說以爲將來的研究指路，藉此尋找另類的（alternative）主敘事，這與其批

46 事實上，相較於胡繩的看法，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早就指出革命的目的論長久以來便主導並扭曲了中國近現代史。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January 1995), pp. 45-76, esp. pp. 69-70；另收入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37-64, esp. pp. 58-59。而筆者認爲裴宜理對於安源工人運動的重訪（revisit），頗符合本書所要求、不受結果驅使（results-driven）影響的史觀。葉毅均，〈新書評介：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漢學研究通訊》，卷 32 期 4（總期 128，2013 年 11 月），頁 33-34。

47 Paul A. Cohen’s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8:4 (October 2013), p. 1147。當然也有評者讚許本書此項提議，但缺乏進一步的申說。Nancy J. Hodes’s review, *Pacific Affairs*, 87:2 (June 2014), p. 326。

48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China Quarterly*, Vol. 188 (December 2006), pp. 1070-1091。更有甚者，魏格林在另文中強調，冷戰結束之後，海峽兩岸的史家同樣在尋求一個新的主敘事，但卻是爲了不同的國家。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9,” 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5: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15-636。即使如此，至少在臺灣仍有專業史家省思，「我們當代的國族歷史，當然也可能是更爲多元、更爲寬容的敘事模式的產物」。沈松僑，〈召喚沈默的亡者：跨越國族歷史的界線〉，收入《思想》編委會編，《思想 2：歷史與現實》（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頁 90。

評對象又有何本質性的歧異？差別似乎僅僅在於作者拒絕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流行的「懷疑主義」，仍思有以重振主敘事，以及運用理論解釋時的精粗之別而已。然而，主敘事的重構實際上並非無人嘗試，如由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前所長張海鵬領銜主編、集合眾人之力而成的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便是一例。[49]若能具體針對這類具有指標性的作品，加以適切評價，並觀察此一著作在史學界的反響如何，或許較能避免空談，設法解決主敘事究竟需要與否的難題。可惜作者並未述及這套多達 550 萬言的鴻篇巨製，或是其他類似的作品，因此缺乏討論對話的基礎。

總而言之，當「清史」和「民國史」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史學界逐漸確立其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回歸既有的朝代體系之時，處於夾縫之中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未來能否繼續如上個世紀那般蓬勃發展，似乎尚在未定之天。[50]除非中國的「近現代史」一方面能與日本、韓國和臺灣的「近現代史」，乃至於世界其他地域的「近現代史」共同構成一部同中有異、異中求同的歷史，從而形成有意義的指謂與比較基礎。[51]另一方面對中國的「近現代史」在整體國

4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對於這套書初步的討論可見〈《中國近代通史》筆談〉，《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頁 1-25。

50 在「盛世修史」的觀念影響之下，中國大陸在新世紀之初已啓動「國家清史纂修工程」。Zhao Ma, “Wring History in a Prosperous Age: The New Qing History Project,” *Late Imperial China*, 29:1 (June 2008), pp. 120-145。而秉持「後代修前代史」傳統的中國大陸學者，也開始呼籲應由政府主導修纂《中華民國史》。參見陳紅民，〈「民國史觀」與中華民國史新學科體系的構建〉，《民國檔案》，2011 年第 1 期，頁 55-61。當然編修《清史》本該是民國政府的義務，但前有命運多舛的《清史稿》，在「正史」觀念消逝的今日已成陳跡。詳見陳熙遠的精闢分析：Hsi-yuan Chen, “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 2:2 (September 2004), pp. 173-204。至於在臺灣的民國史研究，由於臺灣學者多不認爲「民國」止於 1949 年，遂有「中國近現代史」、「遷臺後民國史」與「戰後臺灣史」三者之間的複雜糾葛。詳見林正慧，〈遷台後民國史之定位及思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下冊，頁 1067-1128。由此可見「民國史」在臺灣有其特殊的問題性。

51 就此而言，在現代化典範下產生的眾多經驗研究，或許仍有再生的機會。Michael Gasster, “The Modernization Debat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 1-29。當然美國學界本身由於現實局勢的刺激（官方接連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因而對於現代化典範的批判，依然無時或已。在此僅舉兩例：Harry Harootunian,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aradigm Lost, and Regained*

史分期上的界定重新加以省思，定義爲更具自我批判性的概念，才可能有發展的空間。[52]但無論如何，作者自述本書的終極關懷在於，「是否有可能在不扭曲歷史實在的情況之下，再現中國的過去並使之具有意義」。（p. 3）此一提問實別具感觸。而本書作者意圖清理史學論述中的結構，乃至於重新尋覓意義的雄心壯志，更令筆者肅然起敬。本文既著眼於拾遺補闕，意不在行求全之毀，而是對本書之宏願及其成就表示最大的禮讚。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4); Michael E. Latham, *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52 在這方面，日本學者如溝口雄三、岸本美緒等人皆曾撰文討論，值得借鑑其思路。參見溝口雄三著，王瑞根譯，〈中國近代的源流〉，《中國的衝擊》（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89-102；岸本美緒著，黃東蘭譯，〈中國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收入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81-98。